

暨南大学 宋元明清史论集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暨南大学 研究生部 编
历史学系

1997年10月广州

暨南大学
宋元明清史论集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暨南大学研究生部 编
暨南大学历史系

前 言

创办于1906年的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已走过了九十余年的坎坷历程，发展为今天拥有七个学院，包含文、理、工、经、医等学科的综合大学，在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是海外华侨华人学子向往的大学。

暨南大学历史系创建于1928年。1949年以前，拥有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周谷城、周予同、沈炼之、丁山、谭其骧等人；1949年后，又有著名历史学家陈序经、陈乐素、金应熙、朱杰勤等人任教，从而奠定了暨大历史学研究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1949年以前，暨大南洋研究馆颇负盛名，在东南亚史、华侨史与岭南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开拓性研究。1949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宋史、中外关系史、华侨史、粤港澳关系史、港澳史等方面的研究，又颇有成就。七十年来，历史学研究一直是暨南大学有实力、有影响的学科之一，对团结教育海外华侨华人，产生了良好影响。

自1978年复办以来，暨南大学的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即是实力雄厚的专业之一。1983年，第二批获得了硕士学位授权，当时的学科带头人是陈乐素教授、金应熙教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古代史专业拥有稳定的学术队伍15人，内含教授9人，副教授6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5人，硕士学位者8人。目前的学科带头人为邱树森教授、张其凡教授、汤开建教授，年龄在48—60岁之间。整个学术队伍呈现出年龄结构合理、学术梯队完整、学术力量雄厚等三大优势。今年5月19日至22日，由暨大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与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在广州与珠海召开的“元史暨宋元文化学术研讨会”，不仅扩大了暨大在中国古代史乃至历史学领域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奠定了暨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主要是宋元史研究）在全国的优势地位。

本书汇集了暨大中国古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主要是1990年以来的学术论文共计34篇，均是各人自选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反映了各位作者的研究水平，从而也可以集中反映出暨大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编辑本书，不仅是集中检阅暨大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想借此机会向全国史学界求教，希望予以批评指正，进一步提高暨大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水平。

张 其 凡

1997年6月20日于广州暨南花园

目 录

前言	1
宋史卷	
张其凡：宋太宗论	1
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	23
试论宋代政治思想的发展	39
“均贫富”口号勿庸置疑	54
《武经总要》编纂时间考	58
菊坡学派：南宋岭南学术的主流	62
龙登高：宋代商人资本析论	79
宋代粮价分析	91
杨芷华：宋代岭南先哲李昉英	110
李昉英《文溪诗》考释	120
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155
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	177
元史卷	
邱树森：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194
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	208
伊本·白图泰眼里的中国穆斯林	229
论妥懽贴睦尔	244
马明达：金代书画家任询考	264

	元代三皇庙学考·····	279
林远辉:	宋元时期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关系的发展与华侨 ·····	295
	元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307
陈伟明:	元代肉类的消费生产与南北差异·····	325
	元代城镇饮食业的经营·····	340
	元代饮食器具的工艺文化特色·····	354
明清史卷		
汤开建:	中葡关系的起点: 上下川岛—Tamao 新考 ····	367
	略论澳门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394
	澳门诸名刍议·····	408
	明代南澳史事初探·····	430
张廷茂:	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448
	明清澳门海上贸易史研究的回顾与设想·····	461
李龙潜:	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474
鲍彦邦:	明代漕粮折色的派征方式·····	512
	明清广东劳动力资源的开发·····	531
刘正刚:	清代前期四川和台湾移民政策之比较·····	549
	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 ——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分布说·····	568
后记	·····	587

宋史卷

宋太宗论

张其凡

宋人每喜言祖宗之法，奉为圭臬。一般以为，“祖”者，太祖也；“宗”者，乃太宗矣。研究宋初历史，论及宋太祖者为数颇多，论及宋太宗者甚少。然而，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笔者在《从高梁河之败到雍熙北征》^①一文中业已指出，宋代的积贫积弱局面，即开始形成于太宗时期。本文则拟全面考察太宗其人及其在位时期的政治状况。

一 即位前的太宗

太宗初名匡义，赵宋开国，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他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十月，死于至道三年（997年）三月，终年五十九岁。撇开早夭者不计，太宗兄弟三人而居其中，哥哥即太祖匡胤，弟弟是廷美（原名匡美、光美），俱为杜太后所生。太祖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廷美生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而大廷美八岁。后来，在雍熙元年（984年）正月廷美死后，太宗曾说廷美的母亲是自己的乳母陈国

夫人耿氏。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此云乳母耿氏所生者，盖廷美得罪后，造为此言。”说出了事情的底蕴。^②

建隆元年（960年），光义二十二岁，参与陈桥兵变。赵宋皇朝建立后，被擢升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五月，太祖亲征据泽潞反抗的李筠，光义被任为大内都点检，留守京城。八月，领泰宁军节度使。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光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光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

太宗早年的事迹，《宋史》卷四《太宗一》仅记载他年青时多读书，工文业，多艺能，仕周官至供奉官都知。端拱元年（988年）二月，太宗在给儿子元僖等人的手诏中曾说：“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其父弘殷）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踏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授开封府。”^③太宗这里所说的是他二十三岁以前的情况，太祖即位后的事准确无误，但太祖即位前的事则多有舛误。太宗年十六，是后周显德元年（954年）；而周世宗征淮南，赵弘殷从行，在显德三年（956年）。太宗年十八，是显德三年；而周世宗下瓦桥关，是显德六年（959年），当时太宗二十一岁。这是太宗记忆偶误还是造为此言，难以遽定。但是，征淮南、下瓦桥两事，并未载人据《实录》、《国史》成书的《宋史·太宗本纪》，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太宗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从小学习弓马，是有可能的，但太宗青少年时代并无多少可言之事迹，也是确实的。否则，正史中应有详尽记载。

建隆二年光义为开封尹后，直到开宝九年（976年）即位，历

时约十六年之久。太宗自己说是：“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穡，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④深居于开封府中的光义，能够了解多少民情，是令人怀疑的；若说是熟悉政事，那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光义利用开封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了一批幕僚，文武皆备，养成了自己的势力。《玉壶清话》卷七记载，光义“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宋初著名文臣陶谷撰《清异录》卷上记载：“本朝以亲王尹开封，谓之判南衙，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台湾学者蒋复璁先生撰有《宋太宗晋邸幕府考》一文^⑤，考出给事光义幕府的幕僚、军校至少有六十六人。

光义在开封府时，还着意拉拢文武大臣，以扩大影响与势力。《宋史》卷二六〇《田重进传》和《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七月记载，光义曾派人给禁军将领——控鹤指挥使田重进和御史中丞刘温叟送礼，被二人拒绝。由此可以推知，接收礼物的大臣必然更多，只不过不见于史籍罢了。除用送礼拉拢外，用排解纷难的办法交结大臣，也是光义的一种手段。《长编》卷一三记载，开宝五年七月时，仓储不足，太祖切责权判三司楚昭辅，昭辅求救于光义，光义让幕僚陈从信画策，禀告太祖，太祖从其计而行，为楚昭辅解了围。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便势力大盛，“威望隆而羽翼成”，为他争夺帝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太祖与光义的关系如何呢？《宋史》卷三《太祖三》载：“太宗尝病亟，帝（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明人程敏政在《宋纪受终考》一书中即说：“观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与夫龙行虎步之语，始终无纒芥之隙。”果真如此吗？恐或不然。太祖友爱其弟，尚可置信；所谓龙行虎步之语，则当出于光义或其亲信所虚构；若说太祖与光义

“始终无纒芥之隙”，则更属专图美化的无稽之谈。

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在《宋太宗继统考实》^⑥一文中已用事例考证，太祖与光义是有矛盾的。除张先生所引事例外，尚有其他事例可证。《默记》卷下载：

颖上安希武殿直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官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太祖知道安习为光义窃买女子事，即严捕安习，分明是警告光义，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开宝九年，太祖曾去西京。在此之前，太祖征李筠、李重进，征北汉，都留光义守东京，独在此次要光义随行，并且到西京洛阳后，打算迁都。太祖迁都的目的，除了避开辽的锋芒外，脱离光义根深基固的东京开封府，恐怕也是一种因素。光义激烈反对此举，也透露了一点信息。太宗即位后，为显示太祖欲传于己，当然要大肆宣扬太祖与己友爱，有传位之意。因此，指望太宗时及其后的史籍明确留下光义与太祖关系不和睦的记载，是不可能的。从史籍中透露的蛛丝马迹看，二人有隙，确是事实。

二 太宗与赵普

赵宋皇朝的开国奠基者，实在是太祖与赵普两人。南宋史臣洪迈说：“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臣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

赖。”^⑦万历《顺天府志》卷五《功烈》说：“当国事草创，制度周悉，无出其（赵普）右。”太祖也曾对赵普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⑧上述记载，足可反映出赵普在创建赵宋皇朝上的功绩与地位。

由于赵普在太祖朝的地位和权势，光义在太祖朝地位的升迁，乃至光义的即位，都与赵普不无关系；而太宗统治的稳固，也端赖于赵普的襄助。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二人之间的关系。

太祖即位之初，光义与赵普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国老谈苑》卷上记载，建隆元年五月，太祖亲征李筠，赵普通过光义请行，得到太祖同意。《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记载，杜太后“尤爱皇弟光义，然未尝假以颜色，光义每出，辄戒之曰：‘必与赵书记（即普）偕行乃可。’仍刻景以待其归，光义不敢违。”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亲近，一来可学习吏道，二来可巩固与提高其地位。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两人关系较为密切，时相过从。

建隆二年六月，杜太后死去。七月，光义出任开封尹、同平章事。赵普时任枢密副使。五代时期，继位人一般都封王，任开封尹。光义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尹，已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然而，光义与赵普的关系，却日渐疏远。乾德二年（964年）赵普独相后，“事无大小，尽决于普”^⑨。光义与赵普，开始了明争暗斗。蒋复璁有《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之政争》^⑩一文，详细考察了光义与赵普明争暗斗的情况。文中提及《长编》记载的冯瓚贿赂光义幕僚被流放事，光义幕僚宋琪与赵普交好被光义白太祖出知龙州事，光义幕僚姚恕坐法为赵普所诛杀事等，完全可以反映出光义与赵普的激烈争斗。

光义于建隆二年七月为开封尹、同平章事以后，乾德二年六月兼中书令，开宝四年（971年）七月被赐门戟十四支。但是，直到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赵普罢相时，光义一直未得封王，朝会

排班也位在宰相之下。八月壬申（23日）赵普罢相，九月己巳（19日）光义即封晋王，壬申（22日）诏晋王位居宰相上。赵普罢相刚一月，光义即封王，位居宰相上，这不正好反映出，光义不得封王是与赵普有关系吗？赵普抑光义不得封王，实际上是反对光义继位。

《曲洧旧闻》卷一载：“世传太祖将禅位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启。”《丁晋公谈录》载：“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还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玉壶清话》卷三载，窜逐卢多逊于朱崖以后，太宗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这些传闻是否可靠，难以确定，但以之与正史的记载相对照，则可知也并非无稽之谈。

《长编》卷三三载，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赵普死后，太宗曾对近臣说，赵普“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所谓“不足”，史无明言。但能使太宗耿耿于怀，至死不忘，除了继位大事外，还能有什么呢！既曰“众人所知”，则流传朝野，录入小说、笔记，也就不足怪了。《宋史》卷二四四《廷美传》载：“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据此推断，赵普在太祖时曾进言，反对光义继位，言之成理。《宋论》卷二曰：

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偏，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献谋，其事甚秘，卢多逊窥见以摘发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

所谓“母志”云云，乃指“金匱之盟”，后文将论述，此不赘。然《长编》卷一四载，赵普罢相就镇时，曾上奏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实属欲盖弥彰。虽或此章真伪大有疑问，仍可反映出，赵普的罢相，主要原因固然是专权太过，直接因素则是参预定储大计，与太祖谋不合，受人（卢多逊？）攻击。赵普罢相后，卢多逊升任参知政事，光义则封

王、位在宰相上，基本确立了继位人的地位。

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①。他救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瓚于将戮之时，罢符彦卿典兵成命于已颁之后，都是人所难为之事。因此，赵普在宋初不仅权倾中外，而且为佐命诸将所敬畏，其地位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太祖既不采纳他关于继位问题的意见，便不能再留他在朝为相，否则，光义仍无法继位。试看太宗去世后，宰相吕端在立真宗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便可明了此点。^②况且，吕端的权势、地位、影响和才干等均远不及赵普。

太宗即位后，对赵普仍有猜疑之心。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就罢去了赵普领支郡之权；赵普到京朝见，太宗又罢其使相，以太子少保留京。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普从平太原，覃赏不及。“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以致从者皆去，唯余王继英一人。^③后来，通过赵普密奏的形式，出现了“金匱之盟”，为太宗继位找到了合法的根据，赵普与太宗的关系才得以缓解，遂再度出任宰相。此后，太宗虽则表面上对赵普尊宠有加，实际上是猜忌防备的。赵普对太宗，也是处处提防。他小心谨慎，“家问中指枋审细，字画谨严”；雍熙年间，赵普在外为使相，遣夫人朝太宗，留子承宗侍卫京师^④，都是要去太宗之疑。太宗朝，赵普虽也两度为相，但总共不过四年，没有多大作为。

总而言之，太宗与赵普的关系，初则密切，继而争斗，终至若即若离地互相利用，到赵普死时仍有隔阂。太宗因在明争暗斗中战胜了赵普而确立了实际继位人的地位，又因赵普的帮助而稳固了统治，但二人始终是互相猜疑和戒备的。

三 太宗之继位

开宝九年十月，太宗猝然死去，年仅五十岁。作为皇弟的光

义，时任晋王兼开封尹，继承了皇位。

关于太祖之死和太宗继位，有“烛影斧声”和“金匱之盟”两大疑案，引起后人的争执、猜测，其真相今天已经难以完全搞清楚了。^⑮太宗继位的两大疑案，对于太宗和真宗时期的政治，乃至整个北宋及南宋初期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谈到太宗时，不能不剖析这两大疑案。

关于太祖之死，《宋史》卷三《太祖三》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长编》卷一七的记载比较详细，是综合了《湘山野录》、《涑水记闻》等书而录入的。现录于下：

十月壬子（19日），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20日），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荣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官。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甲寅（21日），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

正是《长编》记载的传世，使“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说法广为流传。从《长编》的记载，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太祖是猝死的。开宝九年正月到十月，每个月都有太祖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现存史籍中，直到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和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而二十日太祖却死去了，死得很突然。日本学者荒木敏夫，推断太祖是由于饮酒过度，而在一夜之间猝死的。^⑩太祖喜饮酒，这是事实，但早在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他就对近臣说：“沈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⑪说明他对饮酒已有所节制，从而不大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其二，太祖死时，没有传位遗诏。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利见之辰事，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已即位事，静南节度使宋湜言白龙出现事，都反映了晋王光义在为继位的合法化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张荫麟先生说：“此类事通常只见于两朝嬗递之际。使太宗之继统而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⑫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

其三，光义预知太祖之死。十九日晚太祖召光义饮酒，二十日清晨光义即派程德玄预先在府门前等候内侍召人，说明光义已知太祖必死于二十日晨。

其四，光义是抢得帝位的。王继恩说事久将为它人有，程德玄要光义直前勿等，宋后以母子之命相托，都说明光义是用强力夺得帝位的。继恩召时，光义入久不出，显然是在部署，以确保抢位成功。直到一天以后才即位，也反映出光义的即位遇到了阻碍。

上述几点足以证明，太祖之死与太宗有关，太宗是直接获益者。至于太祖猝死之因，从种种迹象分析，光义在酒中下毒是最为可能的。

《默记》卷上记载，太宗以牵机药赐死李煜；据《烬余录》甲编，孟昶和钱俶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毒死的。看来，酒中下毒是太宗惯用手法。在《长编》的记载中，有一个医官程德玄，是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长编》卷三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亦载：“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太宗）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受到如此宠遇，推究其因，可能是用医术帮助了光义登位。

另外可注意的是，太祖死后，两位宰相——薛居正、沈义伦不见有所动作。《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宰相》说：“居正、义伦，不过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参知政事卢多逊则升为宰相，隐约反映出他为太宗继位出了力。赵普罢相出知河阳，实在是给了光义夺位以莫大便利。

在太宗及其后裔统治一百余年之后，尚能留下如许蛛丝马迹，则太宗继位之时，其篡位之迹，自是更彰，人心、士大夫之不服，乃势所必然。《长编》卷三八载，至道元年十二月，太宗曾对待臣说，他即位之始，有“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的情况出现。有鉴于此，太宗从安抚人心，培植亲信，树立和提高自己的威望等三个方面来安定局面，巩固其统治地位。

安抚人心。一是宣布一切依照太祖时的章程办理，以示自己是太祖事业的继承者。太宗即位伊始，便下令：“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太宗又对宰臣说：“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今四方无虞，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最为急务，此委相之大体也。”^①二是安抚皇室和宰执大臣等。太宗即位后，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以

示与太祖时皇弟封王、尹开封相同。以太祖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诏廷美、德昭并位在宰相上。又封太祖子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太宗还下令，太祖与廷美的子女俱称皇子、皇女，进封太祖三女为郑国、许国、虢国公主。宰相薛居正、沈义伦、卢多逊均加官，其子也加官晋爵；枢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副使楚昭辅升为枢密使。

太宗特别注意培植和提拔亲信，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开封府的幕僚，如程羽、贾琰、郭贽、商凤等人，或知开封府，或为枢密直学士，或为东上阁门使。开封府的军校，如杨守一、赵谔、周莹、王显等人，都“畀以兵食之重寄”，先后掌管枢密院。^⑳太宗时的枢密院，后来几乎成了开封府幕府旧人的囊中物。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即太宗即位后三个月，在科举考试中即一举录取进士及诸科五百人之多，其中进士达一百九人，“皆先赐绿袍鞞笏，锡宴开宝寺”，太宗自为诗二章赐之。比起太祖时一次最多录取进士三十一人，人数大增，而且授官也比以前优厚，进士第一、二等俱通判诸州。史称：“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宰相薛居正等人说取士太多，用人太骤，太宗不听。进士及诸科人员赴任辞行时，特召令升殿，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利于民者，疾置以闻。”仍赐装钱，人二十万。^㉑其目的，一方面是拉拢士大夫为己用，另一方面是急于用这些“天子门生”去掌握地方大权。

为收买人心以为己用，对太祖临终前要治罪的川、峡两路转运使申文玮、韩可玘，太宗释而不问。在太祖时“献宫词，托意求进用”的孔承恭，“太祖怒其引论非宜，免归故里”，太宗以赦复授故官。^㉒

太宗还派亲信侦探下情，以为防范。太宗即位不久，即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